

# 钢铁人生钢铁梦

曹智堂

改革开放以后，我调入宝钢，宝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钢铁巨擘。它汇集了我国钢铁战线上的骨干和精英，也汇集了从领导到群众每一个人的理想和才华，拓宽了我们的人生航道。我在宝钢度过了我的青壮年时代，我把我的青春年代的理想和情感都带到了这里，献给了宝钢。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宝钢建设初期和缓建阶段，现场工作和生活条件是十分困难的，当时我作为生产甲方代表，坚守在工地的帐篷里上班，与冶建单位一起，春节期间冒着严寒，在五十米高的高炉炉顶，处理、解决可能会影响今后正常生产的重大质量问题，受到当时任宝钢总指挥的冶金部副部长马承德同志的接见和勉励。

一九八五年九月新中国第一座世界级的大高炉流出了铁水。作为高炉设备的负责人，要保证几百台设备运转正常，我们作业区的同志们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劳动。在炉前迎着沸腾的铁水，我也迎来了我人生道路上最为激动人心的岁月。投产以后，设备系统需要进行一次大修，这包括原料、焦化、烧结、高炉和能源等系统，但当时宝钢是单高炉系统生产，大修必须在不停产的情况下进行。按照国外的经验，大修是由点检作业长负责指挥实施的。而我是宝钢高炉设备第一任作业长，就被委以这一联合大修负责人的重任。这么一个由千余人参加，几百个项目的大修项目由一位点检作业长担任总指挥在新中国还是第一次。只能成功，不准失败，否则将造成宝钢全面停产，后果不堪设想。在精细地准备后，经过几天几夜的奋战，各方配合和协调，我和我们工段的同志们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后来，我在此岗位上指挥实施了十八次高炉地区的定修作业，我五十岁的生日也是在高炉检修中度过的。

当然宝钢生产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九八八年初，由于种种原因，高炉炉顶设备小料钟发生异常磨损，炉顶压力下降，炉况恶化，生铁产量直线下降，严重威胁当时由单高炉组织生产的宝钢生产情况。经过复杂测算和鉴定，我向领导建议：报废的小料钟经修复后可以重新使用。经过日夜奋战和同志们一起努力，小料钟修复重新使用，终于成功了。我们的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但这在日本也是没有先例的。那日凌晨，我从炉顶下来，一股喜悦的暖流，使我忘却了料峭的春寒，我看到了旭日冉冉在东方升起。一九八八年高炉产量超额完成，宝钢生产也顺利达到各项指标。

现在宝钢已经雄立于世界钢铁之前列。我本人也得到过各种嘉奖，还获评过上海市“讲理想、比贡献”的个人先进。实现了我的人生理想。后来我又受冶金部的委派，在何麟生厂长的领导下到津巴布韦当专家，成为新中国第一批援外专家，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将宝钢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成功地移植到了国外，得到了各方的好评，为此我还出席过津巴布韦的国宴。我将钢铁梦延伸到了国外！

# 沧海桑田 小康垂成

## ——上海发展给市民带来的人生机遇和展示舞台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抚今忆昔，上海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满满，有许多切切实实的体会乐意分享给所有读者。

为此，“夜光杯”特设“百家话小康·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栏目，举行大型征文活动，收到大量来稿，业已连续刊登了不少文章。现在，我们根据来稿所涉题材内容，对上海市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一定的分类、梳理，以专版形式予以集中刊登。今天呈现的专题是“百家话小康·上海发展给市民带来的人生机遇和展示舞台”，敬请关注。

## 业主员工和谐奔小康 ◆ 张应昌

我在1991年退休，我在退休前所做的工作，都是被动的执行者。改革开放了，可以自主创业。这是一个多么好的时代和潜在难逢的机遇呀。

我是宁波人，平时爱吃家乡年糕类食品，上海市场上年糕类食品很多也很好，可是符合我从小吃惯的那种口味很难买到。平时与同乡谈起时，大家都有同感。我深思后认为，在沪的宁波人很多，若能生产出适合宁波人口味的食品，既可给同乡人享口福，又能获利多好多。

办企业赚钱要放在第二位，第一位是树立企业的品牌，保证产品质量，诚信经营。

树品牌，把牢产品质量关，首先心怀道德良心，选购原料要好，生产过程中，优良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搭配发挥好。

搞食品生产，我一窍不通，困难很多，凡事只要有兴趣决心搞了，办法总是有的。我去宁波实地参观，学习，聘请专长技师，于1995年在原南市区创办了小作坊。

家和万事兴，业主和员工也是和

睦相处，共同进步，才能把企业办好搞活。

小企业创办至今，已25年了，现有16名员工，其中四对夫妻已连续工作了23年。四对夫妻员工始终认真负责，积极工作。顾客们长期认可欢迎，爱吃我们的产品，都是他们和其他员工共同坚持努力的结果。由于产品好，信誉好，我在1999年把小作坊更名为“上海糯勿糯食品有限公司”，并向国家申办了注册商标，有关媒体先后为我们宣扬报导多次。

在产量逐年提高，收益增加，业主除增加员工工资外，对四对夫妻在河南，安徽农村的孩子，寒暑假来沪时，报销路费，陪他们游玩市区动物园留影，回乡时送些衣物。

如此良性循环，业主收入多了，首先进入了小康行列。如业主退休前，是骑自行车上下班的，骑的还是老“坦克”，现在先后购置了三辆客货车。四对夫妻员工，由于他们各自勤俭，加上业主常给他们奖金和补贴，他们也都先后在自己农村的县城里买好了新建住房，奔向小康生活中。

小康生活不仅有物质的，更有精神的。改革开放就给了我一生难忘的机遇。这次机遇就发生在上海。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在上海杨浦区闸殷路60弄50号，有一座当年属于华东电管局的干部学校。当时学校是新创办的，1982年秋季我有幸成为该校的首届进修生。

两年后，我们企业管理、党政干部和物资管理三个专业四个班的160名学员，回到进校前各自的发电厂、供电公司 and 电建企业，相继走上了专业管理和企业中、高层领导的岗位。

这是一段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求学经历。

改革开放号角吹响，华东区域电力建设得到快速的发展，大容量高参数的大机组、高电压大容量等级的大电网，相继建设投产。与此同时，解放后进入电力企业的老干部，亦进入了退休期。为此，企业领导从中层到高层，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状况；而知识化、年轻化、专业化的时代需求，亦对企业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这批学员，经过组织推荐、考试合格后，进入干校进修。

上海本来就是个高校云集的地方，师资力量雄厚。干校的基础课教师，是从各大名校聘请而至；专业课老师，则是从当年电管局各处室中，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员里选调。这一切，都是干校首任校长何介虹先生的一手精心操办。崭新的教学楼，宽敞舒适的寝室，还有设备齐全的运动场，使我们学员感到温馨如归。

紧张的学习，从每天的六堂课开始。毕竟都是三十出头的年龄，少数学员已临近四十岁了。学员原先的学历知识，需要加温，记忆力需要再次唤醒，这似乎都成了我们学员面前的一只只拦路虎。面对困难，怎么办？当然是搬搬书！我记得每逢期终考试前，我就把高等数学的公式，用十厘米见方的白纸抄好，用一枚枚大头针，将纸别在睡床的蚊帐内，使我能每天睡觉前默念数遍，加深记忆。

为了保证学员有充沛的精力投入学习，时年五十多岁的何校长操尽心血，他办公室的灯光，常常通宵达旦地亮着，为的是思考干校如何办好；他还经常下厨房，检查学员的饭菜情况，是否做得美味适口，还时不时叮嘱医务室，要给患病学员看好病、关照伙房做病号饭。各个班的班主任，每天有家不回而住在校内，随时深入教室和学员寝室，促膝谈心。任课老师，经常放弃休息，去教室为大家答疑解惑。

在我们毕业后，学校又连续招收了数届学员，并根据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将专业扩大至财务会计、计划统计等学科。直至学校完成了为企业培养管理骨干这一历史使命后，转入电力党校，干校为华东区域的电力企业，输送了近千名管理人才，为本地区电力建设发展，谱写了辉煌的篇章。

当年的干校所在地，如今已是华东电力培训中心。当年我们从干校盛装知识，为国家的电力建设，奉献了光和热。

# 记住闸殷路干校

卢炳根

## 农家出了31位大学生 ◆ 胡甘甘

余读了成人大专，现已退休，月月领着退休金。小姑妈也上了电大，读的是企业管理大专，现在一家民营企业工作。我爸读的是全日制大学本科，现在一家大型集团公司担任领导。

我们下一代，走出大学校门，就成了时髦的白领阶层。我的四个堂哥，都是大学本科毕业，一个在大众汽车公司从事研发工作，一个在材料研究所工作，二个自己创业、开公司做老板。我表哥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现在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担任设计师。我从华东政法

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一家国有银行上海分行从事宣教工作，现在一家上市公司负责投资中心业务。我的两个表妹，一个在上海交通大学、一个在上海财大本科在读。

新中国成立71年，教育事业迅猛发展，不仅保证了我们年轻一代能够得到充分的、良好的文化教育。夜大、电大的推广，双休日的实行，也保证了上一代人能够有时间、方便地接受提高教育，享受终生学习的条件。因而，能使我们一大家庭已有31人接受了高等教育。

考察团，我访问欧洲；次年，我老伴国家公派赴美国进修两年；接着，我女儿、女婿、儿子、媳妇都先后获得了法国巴黎大学、里昂工学院的博士和硕士学位。1986年，我再赴巴黎，与法国开展长达十余年的交流合作，在巴黎核技术大会上被推举为国际顾问团成员，我的收入成倍增长。

昔因追梦奔远方，今为圆梦返故乡。归根故乡三年多，我像一颗衰老的种子落入沃土，老树发新枝，焕发出绚丽多彩的不老人生。年届九旬的我，腰不弯，背不驼，思想敏捷，步履轻快，连头发都保持天然乌黑。不久前，赴老家平湖扫墓，在古刹报本寺，当家主持广能法师，端详我片刻之后说：“施主可以活到103岁！”

## 百岁不是梦 ◆ 周善铸

1992年，我从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退休后，先是应法国国家科研中心邀请，发挥余热工作六年，后投奔儿子，移民加拿大十年。

我曾经接待三位香港大学生家访，看到我老两口住了125平方米宽敞住房，不无羡慕地说，她们家住的是上下铺。闲聊中，透露出毕业后希望有机会来上海工作的愿望。她们说：“我们喜欢上海的书香气氛和人文环境”。十多岁的大孩子，年轻、单纯，童心未泯，还没有学会客套和世故，老伴递上的水蜜桃、哈密瓜和紫葡萄，她们都一扫而光，毫

不拘束。所以，我相信，她们说的是真心话。上海老市长徐匡迪说过，“在中国最辉煌的时候跑开，会终身遗憾！”联想起不少访问上海、北京的加拿大朋友，回国后无不赞不绝口，于是，老伴和我一致决定，留在上海不走了。虽然放弃加拿大枫叶卡，丧失了加拿大老年金，但我每月都收到中、法两国政府退休金，绰绰有余供过于求。人到晚年，比起金钱，更重要的是精神层面的充实和满足。

我原是一名乡镇小学徒，是新中国，让我上了北京大学；是改革开放，使全家都出国留学和工作。1981年，作为中科院核技术